

收藏故宫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Ceramics

古代陶瓷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

故宫博物院 编
吕成龙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 收藏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

古代陶瓷

Ceramics

故宫博物院
吕成龙——主编
编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前 言 吕 成 龙 8

新 石 器 时 代 15

1 彩陶盆.....17	5 白陶双系壶.....21
2 彩陶钵.....18	6 红陶罐.....22
3 彩陶旋涡纹双系罐.....19	7 黑陶双系罐.....23
4 彩陶蛙纹双系罐.....20	

商、西周、春秋、战国、西汉 25

8 白陶雕刻饕餮纹双耳壶.....27	12 酱釉陶壶.....32
9 原始青瓷双系罐.....28	13 青瓷双系壶.....33
10 原始青瓷提梁壶.....29	14 绿釉陶壶.....34
11 原始青瓷划花双系壶.....30	

东 汉、三 国、两 晋、南 北 朝 35

15 青釉堆塑谷仓.....37	19 青釉刻花单柄壶.....41
16 青釉羊.....38	20 青釉莲花尊.....42
17 青釉褐斑羊头壶.....39	21 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43
18 黑釉唾壶.....40	

隋、唐、五 代 45

22 白釉罐.....47	29 三彩烛台.....56
23 青釉划花莲瓣纹四系盘口瓶.....48	30 三彩盖罐.....57
24 越窑青釉八棱瓶.....49	31 花瓷腰鼓.....58
25 越窑青釉执壶.....50	32 花瓷双系瓶.....59
26 邢窑白釉瓶.....52	33 长沙窑褐釉模印贴花双系罐.....60
27 邢窑白釉罐.....53	34 越窑青釉执壶.....61
28 青釉凤首龙柄壶.....54	35 青釉夹耳盖罐.....62

辽、宋、西夏、金 63

36 汝窑淡天青釉三足樽	65	50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婴戏纹碗	83
37 汝窑淡天青釉三足樽承盘	66	51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84
38 官窑粉青釉圆洗	68	52 白釉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	85
39 官窑粉青釉弦纹瓶	70	53 建窑黑釉兔毫纹盏	86
40 哥窑青釉鱼耳炉	72	54 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三凤纹盏	87
41 哥窑青釉碗	74	55 当阳峪窑剔划花缸	88
42 定窑白釉孩儿枕	75	56 黑釉剔花折枝牡丹纹梅瓶	90
43 定窑白釉刻花梅瓶	76	57 三彩划花鹭莲纹盘	92
44 定窑白釉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纹盘	77	58 赤峰窑白釉剔划花填黑牡丹纹尊	93
45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78	59 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	94
46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79	60 白地黑花马戏纹八方枕	95
47 龙泉窑青釉弦纹瓶	80	61 白地黑花诗文如意头形枕	96
48 龙泉窑青釉凤耳瓶	81	62 黑釉剔花缸	97
49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缠枝花纹梅瓶	82		

元代 99

63 青花“满池娇”图菱花口折沿盘	101	67 蓝釉描金匣	108
64 青花海水白龙纹八棱梅瓶	102	68 蓝釉白龙纹盘	110
65 釉里红刻花拔白兔纹玉壶春瓶	103	69 卵白釉印花“太禧”铭云龙纹盘	111
66 青花釉里红镂雕山石花卉纹盖罐	104	70 龙泉窑青釉执壶	114

明代 115

71 青花折枝菊花纹执壶	117	78 青花描金彩缠枝苜蓿花纹碗	130
72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118	79 甜白釉划花缠枝莲纹梅瓶	132
73 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石榴尊	120	80 鲜红釉高足碗	133
74 釉里红拔白缠枝花纹碗	122	81 翠青釉三系盖罐	134
75 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124	82 青花篮查体梵文出戟盖罐	135
76 青花缠枝花纹背壶	126	83 青花海水白龙纹扁壶	138
77 青花枇杷绶带鸟纹菱花口折沿盘	128	84 釉里红三角纹高足碗	140

85 鲜红釉葵花式洗	142
86 祭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144
87 仿汝釉蟋蟀罐	146
88 仿哥釉菊瓣碗	147
89 酱釉盘	148
90 青花松竹梅纹罐	149
91 青花八仙庆寿图罐	150
92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151
93 青花麒麟纹盘	152
94 斗彩鸡缸杯	154
95 斗彩海水云龙纹“天”字盖罐	156
96 斗彩婴戏图杯	158
97 斗彩葡萄纹高足杯	159
98 五彩缠枝牡丹纹罐	160
99 仿哥釉八方高足杯	161
100 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	162
101 白地刻花海水绿彩云龙纹碗	164
102 白地酱彩花果纹盘	166
103 黄釉描金兽耳罐	168
104 青花婴戏图碗	169
105 白釉矾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	170
106 黄地绿彩云龙纹尊	172
107 素三彩海蟾纹三足洗	173
108 素三彩折枝蔓草纹水仙盆	174
109 孔雀绿釉碗	175
110 青花“寿”字云龙纹罐	176
111 红地黄彩缠枝莲纹葫芦瓶	177
112 五彩云鹤纹罐	178
113 白釉塑贴红蟠螭纹蒜头瓶	179
114 五彩龙穿莲池纹绣墩	180
115 青花团龙纹提梁壶	182
116 青花龙穿花纹梅瓶	183
117 青五彩镂空云凤纹瓶	184
118 绿地黄彩云龙纹盖罐	186
119 紫地素三彩折枝花果云龙纹盘	188
120 淡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碗	189
121 法华人物图罐	190
122 龙泉窑青釉刻花碗	191
123 德化窑白釉达摩像	192
124 德化窑白釉观音像	193
125 德化窑白釉刻花玉兰纹尊	196
126 石湾窑钧蓝釉楸叶式洗	197
127 宜兴窑天蓝釉莲花式洗	198
128 青花花卉纹出戟花觚	199
129 青花罗汉图钟	200
130 青花人物故事图缸	202

清代 203

131 青花洞石楸叶诗句盘	205
132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	206
133 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	207
134 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缸	208
135 青花团花纹摇铃尊	210
136 釉里三色山水纹笔筒	211
137 五彩描金鹭莲纹凤尾尊	212
138 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	214
139 黄地开光珐琅彩花卉纹碗	215
140 绿地红彩云龙纹盘	216
141 黄地红彩二龙赶珠纹碗	218
142 素三彩渔家乐图长方几	220

143 素三彩暗花云龙花果纹盘	222	172 斗彩荷花图鼓钉绣墩	256
144 雾红釉笔筒	224	173 黑地绿彩缠枝莲纹梅瓶	257
145 郎窑红釉观音尊	225	174 黄地紫绿彩勾莲纹瓶	258
146 豇豆红釉菊瓣瓶	226	175 各种釉彩大瓶	260
147 天蓝釉暗花兽面纹螭耳尊	227	176 厂官釉螭耳尊	262
148 洒蓝地描金带盖糊斗	228	177 青花云龙纹螭耳瓶	263
149 孔雀绿釉花觚	229	178 油红地五彩描金婴戏纹碗	264
150 青花桃蝠纹橄榄式瓶	230	179 粉彩籁瓜纹碗	266
151 釉里红花蝶纹笔筒	231	180 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双耳瓶	268
152 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	232	181 粉彩“御窑厂图”螭耳瓶	269
153 珐琅彩松竹梅纹瓶	234	182 珊瑚红地白梅花纹盖碗	272
154 粉彩蟠桃纹天球瓶	235	183 黄釉刻花仿竹雕笔筒	274
155 粉彩镂空盖盒	236	184 德化窑白釉兽耳瓶	275
156 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瓶	238	185 宜兴窑紫砂茶壶	276
157 斗彩团花纹罐	239	186 青花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	277
158 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	240	187 绿地粉彩开光花鸟纹方瓶	278
159 蓝地黄彩折枝花纹盘	242	188 斗彩描金缠枝花纹碗	279
160 窑变釉弦纹瓶	244	189 青花云龙纹赏瓶	280
161 炉钧釉铺首耳壶	245	190 淡黄地红蝠金彩团“寿”字盘	281
162 淡黄釉瓶	246	191 砚红地金彩“囍”字盒	284
163 胭脂红釉盘	247	192 雾红釉玉壶春瓶	286
164 秋葵绿釉如意耳尊	248	193 青花松鼠葡萄纹碗	287
165 黄地青花缠枝莲纹交泰转心瓶	249	194 青花花卉纹花盆、盆托	288
166 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	250	195 莲荷地粉彩花卉纹捧盒	290
167 珐琅彩诗句花卉纹瓶	251	196 粉彩鹭鸶莲花纹高足碗	291
168 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灯罩	252	197 莲荷地粉彩花鸟纹方花盆、盆托	292
169 粉彩描金书函式金钟笔	253	198 窑变釉杏元瓶	293
170 仿木纹釉地粉彩松鹤图笔筒	254	199 东青釉杏元瓶	294
171 粉彩像生果品瓷盘	255	200 醴陵窑釉下五彩花鸟纹瓶	295
参考书目	296		
后记	297		

前言

吕成龙

[1]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3期。

瓷器是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之一。中国瓷器生产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品种繁多,质地优良,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如唐代诗人陆龟蒙(?~约881年)曾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当时越窑秘色瓷的釉色像翠绿色山峦一样美丽。唐代另一位诗人顾况(约715~814年)用“越泥似玉之瓯”来比喻越窑青瓷像玉一样润泽。中国瓷器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珍视,并被许多国家仿制。普鲁士皇帝选皇后的故事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1713年至1740年间,普鲁士皇帝曾以六百名萨克逊近卫军向邻邦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花瓶,用来为他的婚礼增色。这些花瓶至今还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中,被人们称为“近卫花瓶”。中国素有“瓷国”之誉,英语中的china既指中国,亦指“瓷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在世界上影响之深远。

瓷器是中国先民在长期从事陶器生产的基础上所发明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国家之一,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先民已经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制作陶器。虽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如古埃及、叙利亚、印度等,也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制作陶器,而且后来制陶技术都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们都没能发明制瓷技术,瓷器的发明权为中国所独享,是我们祖先高度智慧的结晶。

一般来说,瓷器的成功烧造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使用瓷土;二是烧成温度要达到1200°C以上;三是器物表面要施高温釉。关于我国何时发明瓷器,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界曾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发明于商代,有人认为发明于六朝时期,还有人认为发明于唐代。最终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考古学家将瓷器(青瓷)发明的时间定在东汉,这是以考古发掘资料和科学化验数据为依据的。首先,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余姚等地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青瓷窑址,其次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出土的一件模印斜方格纹青瓷罍残片进行测试分析,证明其烧成温度、显气孔率、吸水率、抗弯强度、烧结程度及胎釉结合程度等都已符合现代瓷器标准^[1]。另外,浙江、江苏等省的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可与窑址出土物相互印证。至于早在商代中期就已发明并延续烧造至西汉时期的施青釉的器物,因其胎料的纯度、烧成温度、胎釉结合程度以及机械强度等都略逊于现代瓷器标准,故被视为瓷器诞生以前过渡时期的产物,一般称为“原始瓷器”。因此,若从东汉发明瓷器算起,中国的瓷器生产已有约1800年的历史。

青瓷自东汉在南方首先出现以来,即以其耐高温、易清洗、美观雅致等优点,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获得很大发展,制瓷区域由南方扩大到北方,胎釉质量进一步提高,造型式样日渐增多,装饰方法和题材亦越来越丰富,烧造

- [2]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 [4]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 [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

技术更加成熟。从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物可以看出,青瓷已逐渐替代青铜器、漆器、陶器等,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冥器,这说明青瓷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用具。这一时期的青瓷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均有其演变规律:在造型方面是由矮胖向瘦高发展;在装饰方面,三国至西晋时盛行的由花蕊、联珠、网格、菱形等图案组成的带状纹饰,沿用至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即趋于消失,约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开始出现的在青瓷上涂点褐色斑点的装饰技法,至东晋时颇为流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达到兴盛。南朝造佛像皈依佛门之风极盛,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盛极一时的佛教艺术在当时的青瓷上也有所反映,如南北朝青瓷上盛行刻划莲瓣纹、忍冬纹等,特别是目前已发现的十多件集模印、塑贴、刻划技法于一身的青瓷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通体饰仰、覆莲花瓣及菩提树叶、忍冬纹等,成为这一时期青瓷器上盛行佛教艺术题材集大成的代表作。

江南地区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中常出土一种青釉谷仓,这种谷仓是由汉代的五联罐演变而来,其上堆塑各种人物、飞禽走兽等。1976年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出土一件青釉谷仓^[2],其上堆塑的龟驮碑上刻划“元康始宁,用此罍,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可知六朝时人们称这种器物为“罍”(音灵)。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青釉谷仓,系本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谷仓上部堆塑崇楼、亭阙、人物、耗子、鸟、鹿、猪、龟、鱼等,其腹部刻划狗、鱼、龙等纹饰及“飞”、“鹿”、“句”、“五种”等字样,龟驮碑上刻划“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二十四字(“永安”是三国时东吴景帝孙休的年号,“永安三年”即260年)。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立体雕饰,展现了1700多年前江南吴国庄园五谷丰登的场面,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用它来随葬,是当时人们迷信思想所为,其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超度逝者亡灵。

我国在北朝时期还成功地烧造出白瓷,这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1958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车骑将军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3],胎体洁白,釉面莹亮,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

隋代瓷器生产以青瓷为主,其造型基本上沿袭南北朝青瓷,盘口瓶、高足盘是其中的典型器。在施釉工艺方面,一般器内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其装饰技法有刻、划、印、塑贴等。装饰题材常见有莲瓣、复线、朵花、花叶、忍冬等。《隋书·何稠传》载:“何稠,字桂林……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骑射侍郎。”说明当时何稠能以青绿色瓷器模仿琉璃并达到乱真的程度。

隋代白瓷产量不大,但从西安隋代李静训墓^[4]、郭家滩隋代姬威墓^[5]、河南安阳隋

[6] 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7]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代张盛墓^[6]出土的白瓷盖罐、白瓷龙柄鸡头壶、白瓷双龙耳尊等来看，均造型优美，釉面光洁，反映出当时白瓷生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唐、五代是个辉煌时期。首先表现在瓷器生产之繁盛，见诸考古报道的瓷窑数量即数以百计，分布在如今之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其中又以河南、浙江最为密集。窑场既然众多，竞争就不可避免，一些瓷窑的产品上开始刻划或书写广告用语，如“丁道刚作瓶大好”、“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在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越窑、邢窑、长沙窑、鲁山窑等一批著名瓷窑，它们所产瓷器均以其独特的风貌饮誉当代，光耀千古。其次，唐、五代瓷器不但品种增多，而且更讲究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造型多模仿当时的金、银器，显得精致典雅。唐、五代瓷器的胎骨更加坚实致密，叩击时能发出金石之声，唐代宫廷乐师曾用越窑青瓷碗和邢窑白瓷碗充当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唐人段安节于9世纪80年代所作《乐府杂录》“击瓯”条曰：“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箭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击缶。”

浙江的越窑青瓷是传统青瓷的典范，河北邢窑白瓷是新兴白瓷的代表，今人常以“南青北白”描述唐代瓷器的概况，这是从地域方面大致划分，实际情况还要丰富得多。从目前已调查唐代窑址的情况看，烧青瓷的窑约占70%以上，可见唐代瓷器生产仍以青瓷为主。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从饮茶的角度对当时的青瓷窑进行了一番品评，即：“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陆羽将越窑青瓷评为第一。唐代著名诗人如陆龟蒙、施肩吾、皮日休、孟郊、顾况、郑谷、韩偓、许浑等也都曾赋诗赞美越窑青瓷，说明越窑青瓷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越窑青瓷中质量最精者为“秘色瓷”。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曾出土14件越窑青瓷^[7]，同时出土的衣物账石碑上有咸通十五年（874年）镌刻的碑文，碑文在记载唐懿宗赐给释迦牟尼佛指舍利供奉物品中称这些瓷器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由此可见越窑秘色瓷等级之高。

唐代白瓷无论从烧造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首推邢窑，唐人陆羽《茶经》中有“邢瓷类银”、“邢窑类雪”之品评。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曰：“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代邢窑曾为宫廷烧造过贡瓷，其中刻划“盈”字及“翰林”款者，分别为宫廷内“百宝大盈库”及“翰林院”的订烧器。

唐代瓷器除了青、白两种釉色之外，还有黄釉、黑釉、花釉及茶叶末釉、素地黑釉

花、白釉绿彩、珍珠地划花、白釉釉下蓝彩、青釉釉下褐(绿)彩等。唐代还生产三彩釉陶。唐代花釉瓷简称“花瓷”，其中的花瓷腰鼓在当时曾用作宫廷乐器。唐代南卓在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及四年所作的《羯鼓录》中谈到唐玄宗及其宰相宋璟都善于击羯鼓，并以绝技著称，二人曾在一起讨论鼓事，比较羯鼓与腰鼓声音之优劣，即：“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撝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臻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唐代长沙窑以生产釉下彩绘瓷而独树一帜，既有单一的青釉釉下褐彩、青釉釉下绿彩，亦有二者合用的青釉釉下褐、绿彩。所绘人物、花鸟、飞禽、走兽等，生动传神，意境深远。长沙窑瓷器上还盛行题写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联句、单句、谚语、成语、俗语、广告用语等，以五言诗最为多见，其内容或描写游子的心情，或抒发夫妻离别相思，或反映边塞征战，或赞美春天景色，或反映科举制度，或提醒人们注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节，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如其中的一首“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宣扬的就是读书做官论。

唐三彩创始于唐高宗时期(650~683年)，盛唐(713~755年)时达到极盛。唐三彩的盛行与唐代流行厚葬风俗有很大关系。按唐代文献记载，最高统治者及其下属官僚死后，需按官位等级去领取随葬冥器，如三品以上90件，五品以上60件，九品以上40件。另外，唐三彩之所以受到唐人的喜爱，是因为其丰满雄浑的造型和斑驳华丽的色彩，最能体现大唐盛世雍容大度的气魄，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

宋、金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一个高峰期，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需求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涨。宋代政府重视对外贸易，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设市舶司，拓宽了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市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分布于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40多个县。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涌现出了定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一批著名瓷窑。这些瓷窑的产品在造型、釉色、装饰诸方面，都各具特色，在市场上备受消费者欢迎。一些著名瓷窑的工艺技法被邻近甚至较远地区的瓷窑所模仿，形成一些庞大的瓷窑体系。北方有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系；南方有龙泉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系。在民窑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朝廷先是诏令一些产品质量较好的瓷窑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然后又在某些瓷区设置“官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如汝窑、官窑、钧窑等。因此宋代瓷器形成官、民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造型方面，官窑瓷器多仿古铜器、金银器或玉器，形体规范，尺寸严格，古朴典雅；民窑瓷器造型则灵活多变，讲求实用。在装饰方面，官窑瓷器以釉质取胜，崇尚朴素，追求韵味；

[8]《元史》卷八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四):“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

[9]《元史》卷八十六(志第三十六,百官二):“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

[10]《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三):“太禧宗裡院,秩从一品。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裡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二年,改太禧宗裡院。”

民窑瓷器则讲求刻、划、彩绘等装饰的多样化,以适应人们的各种审美需求。

谈论宋代瓷器常有“五大名窑”之说,此说源自明代《宣德鼎彝谱》一书,书中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由于柴窑不但不属于宋代,而且至今仍是个谜,因此,人们就逐渐不提柴窑,只提五大名窑。五大名窑虽不能涵盖宋代瓷业生产的全貌,但却集中体现了宋代的制瓷水平。汝窑瓷器传世稀少,目前存世不足百件,其特点是青灰色胎,淡天青色釉,多裹足支烧,工艺考究。尤其是细润的淡天青色釉,给人以幽玄静谧的视觉享受,充分体现出宋代社会追求清淡含蓄、自然质朴的审美趣味。官窑瓷器,澄泥为范,胎色铁黑,釉色粉青,釉层莹澈,如冰似玉,极其精致,“紫口铁足”更增添其古朴典雅之美。哥窑瓷器充分利用釉面开片美化自身,“金丝铁线”迂回穿插,交织如网,使宁静的釉面产生韵律美。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主产白瓷的瓷窑,产品常以刻花、划花、印花或描金花进行装饰,有“定州白瓷瓯,颜色天下白”之美称。钧窑所创烧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铜红窑变釉,如诗如画,绚丽斑斓,为瓷器的高温色釉装饰开辟了新的途径。人们曾用“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形容钧釉之美妙。

元、明、清时期,中国的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格局,主要表现在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业凭借天时地利迅猛发展,逐渐显示瓷坛霸主的实力。自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8]掌管烧造官府用瓷开始,我国瓷器生产的重心就逐渐向景德镇转移。明、清时,朝廷又在景德镇设御窑厂,遣官驻厂或命地方官督造,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垄断优质原料,不惜工本地大量烧造宫廷用瓷。由于各朝皇帝审美趣味的不同和社会时尚的变化,促使工匠们不断改进技术,瓷器的花色品种层出不穷。官窑的繁盛带动了民营瓷业的迅猛发展,致使明、清时天下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景德镇也因此而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元、明、清时期的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等虽还在继续烧造日用瓷器,但与景德镇窑相比,无论在产量、质量、品种方面,还是在产品销路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了。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由于元政府实行“匠户”制度,对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比较重视,又加强了对外贸易,致使陶瓷手工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早在元王朝统一中国的前一年(至正15年,即1278年),元朝统治者即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掌管烧造官府用瓷,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传世或出土的署“枢府”或“太禧”铭款的卵白釉瓷器,就是在浮梁瓷局监督下为“枢密院”^[9]和“太禧宗裡院”^[10]烧造的专用瓷。元代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制胎原料的使用方面,即由过去使用单一瓷石,改为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随着

[11] 见初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宋应星《天工开物》。

高岭土的引入，瓷胎中氧化铝(Al_2O_3)含量提高，拓宽了瓷器的烧成温度范围，减少了变形，提高了成品率，同时也为烧造颇有气势的大件器物创造了条件。其次，元代景德镇窑除了继续烧造青白瓷、黑瓷以外，还创烧出青花、釉里红、高温铜红釉、高温钴蓝釉、高温卵白釉以及釉上五彩、孔雀绿釉瓷等新品种。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这些成就，为景德镇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自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朝廷即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此后，历朝沿袭此种制度。御窑厂平时由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都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造，如永乐时派工部使祈鹏、宣德时遣中官张善驻厂督造。明代御窑厂内分工很细，设大碗作、碟作、盘作等23个作坊，有工匠334名，作头58名。从原料开采到最后烧成，“一杯工力，过用七十二方克成器”^[11]。这种精细的分工协作，使生产专业化，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明代御窑厂历时二百余年，烧造了大量精美的瓷器，文献中仅有的几次有关烧造方面的记载足以说明当时产量之惊人。根据《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省大志·陶书》等记载，宣德八年，应掌管御膳机构尚膳监的要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成化年间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烧造御用瓷器最多切久，费不赀”。正德年间，朝廷两度委派宦官至景德镇监造30余万件瓷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朝廷接连不断地下达烧造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八年共烧造65万余件，隆庆朝12万余件，万历五年至二十二年共计51万余件。至于每件瓷器的平均耗费，《明经世文编》第四百四十四卷中有“瓷器节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银二十万两”的记载，由此可推算每件瓷器的平均耗费约为一两白银。从传世品及出土物看，明代永乐、宣德时的青花、鲜红釉、祭蓝釉、甜白釉瓷，成化时的斗彩瓷，弘治时的黄釉瓷，正德时的孔雀绿釉瓷，嘉靖时的瓜皮绿釉瓷，嘉靖、万历时的五彩、素三彩瓷等，集中体现了明代御窑厂的瓷器烧造水平。

清代御窑厂虽在顺治时就已恢复，但当时并未取得显著成就。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后，御窑厂的经营逐渐走上正轨，直至雍正、乾隆两朝，在皇帝的直接关心下，经过臧应选、郎廷极(1663~1715年)、年希尧(？~1738年)、唐英(1682~1756年)等几位督陶官的苦心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明代御窑厂一样的是清代御窑厂亦设二十三作，但其中的“仿古作”和“创新作”属新设作坊，是明代所没有的，由此也决定了清代御窑厂生产的特点是仿古加创新。特别是康、雍、乾三朝，不仅恢复了明代瓷器中所有的花色品种，而且还创烧出大量的新品种。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记载当时御窑厂仿古创新的瓷器达57种之多。从传世实物看，康熙时的青花瓷，以国产上等青料绘画，浓淡有致，呈色鲜丽明艳，别具风格，将青花这门艺术推向

[12] 见[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

根据日本岩波书店1972年4月20日第5次印刷本(日

文)翻译，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

一个新的境界。康熙五彩的重大突破是发明釉上蓝彩瓷器，从而导致康熙时釉上五彩的盛行，改变了明清五彩以青花五彩占主导地位的局面。雍正、乾隆时的斗彩瓷器，将当时新兴的粉彩引入画面，呈现柔润富丽的艺术效果。雍正时的青釉瓷器呈色稳定，烧造技术达到历史上最成熟阶段。另外，浇黄、霁蓝、洒蓝、瓜皮绿、孔雀绿、矾红、紫金釉瓷等传统品种的烧成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代中期以后一度衰落的霁红釉和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瓷，在康熙时即得以恢复，至雍正、乾隆时烧造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清代康、雍、乾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创新品种主要有珐琅彩、粉彩、釉里三色、郎窑红、豇豆红、天蓝釉、厂官釉、窑变釉、仿古玉釉、炉钧釉、虎皮三彩、米黄釉、淡黄釉、珊瑚红釉、松石绿釉、胭脂红釉等，极大地丰富了陶瓷的花色品种。乾隆时还发展了特种制瓷工艺，各种转心瓶、转颈瓶、交泰瓶等，技艺精湛，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而仿核桃、樱桃、柑橘、石榴、花生等干鲜果品，以及仿螃蟹、海螺等水族动物的像生瓷，还有仿漆釉、仿石釉、仿木纹釉以及仿古铜彩瓷器等，均惟妙惟肖，使人仅凭肉眼难辨真假。

乾隆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尤其是清代晚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整个封建社会陷入风雨飘摇的穷途末路之中。瓷器生产亦每况愈下，花色品种急剧减少，几乎无创新可言，只是沿袭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部分品种。

至于清代御窑厂的瓷器生产数量和耗费，总数虽无法统计，但从有关文献记载中亦可略见一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四十四年撰写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曰：“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而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在《陶成纪事》中对这方面的记载更为详细，当时每年秋、冬两季向宫廷上交的圆、琢器皿达六百余桶，其中盘、碗、钟、碟等上色圆器一万六七千件，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万件不等；其瓶、罍、坛、尊、彝等上色琢器二千余件，尚有落选次色二三千件不等。至于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期解送淮关总管年(即年希尧)处呈样或十数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这些产品大约由三百人(包括辅助工和办事人员)完成。每年的总支出是八千两银子。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开始流传到国外，此后历代都被作为重要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其输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沿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波斯；另一条是海路，从广州经波斯湾远达非洲。从中国到非洲，距离一万五千多公里，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先生称之为“充满艰难困苦的陶瓷贸易之路”，“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2]。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

新石器时代





●陶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发现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陶器生产距今已有 10000 多年的历史，陶器是原始先民主要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遗址的分布相当广泛，南北各地均有大量实物资料出土。主要分布区

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草原地区等，而且均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精美的彩陶而闻名，下游地区以工艺精湛的白陶、红陶和黑陶著称。东南沿海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代表。北方草原地区的陶器则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称奇。各地区的陶器虽有其独特之处，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影响。